

# 跃进与折返 :大跃进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回望与省思

许静波

**摘要** “左倾”的“大跃进”是一段短暂的狂飙突进,图书馆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法,分析了图书馆大跃进的时代背景,指出其必然性。一方面,“大跃进”推动了图书馆数量大幅增长,布局更趋完善,激发了技术革新和互助网络形成,优化了组织和人才结构,促进了读者服务的有效开展;但另一方面,业务重心畸形发展,对行业精英进行错误批判等各种激进举措对行业发展造成不可挽回的阻碍。

**关键词** 大跃进;图书馆

**分类号** G259.2

**Abstract** "Left-leaning" "Great Leap Forward" was a brief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library also had been inevitably involv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oints out the inevitability through literature survey. On the one hand, "Great Leap Forward" stimulated a substantial increase of library, perfected the layout, stimulat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formation of cooperative network, optimized organizational and personnel structures and promoted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eader service. However, various radical measures including wrongly criticizing scholars and the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library businesses hampered the librar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Great Leap Forward; Library

**Class Number** G259.2

DOI:10.16384/j.cnki.lwas.2017.01.022

## 1 引言

1958年伊始的“大跃进”是漫卷全国的一次悸动,图书馆不可避免地裹挟进这一集体狂欢。大跃进为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但弹指近60年,图书馆行业对“大跃进”总体性的反思仍然不足,这既体现在对极左思潮反思的失语,又表现为相关研究成果的匮乏。历史往往呈现连续性的内在发展脉络,张明澍通过随机抽样调查发现,当下中国社会左派仍占38.1%，“大跃进”中的一些极端作派也并未绝迹,比如,鼓动非“左”即“右”的极端逻辑。本文从图书馆实务视角,梳理大跃进对行业的积极推动以及用力过猛带来的危害,力求溯源思进,汲取有益于事业发展的一些借鉴和启示。

## 2 图书馆大跃进的社会背景及其必然性

建国以来,经过对旧图书馆的整顿和改造,初步奠定了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础。“一五”期间,图书馆事业随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

第一个发展高潮。1952、1956、1958年开展的扫盲运动,以及遍地开花的诗歌创作和群众性读书运动,改观了民众的文化面貌,并激发了对图书等文化产品的需求。195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为“大跃进”作好了舆论准备。1958年3月21—25日,文化部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工作跃进大会,会议制定了图书馆工作跃进规划,讨论通过了由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29个省、市图书馆向全国图书馆工作者提出的“十比倡议书”。会后,各地区也纷纷召开跃进大会,图书馆大跃进运动由此展开。

时代背景下,图书馆大跃进的发动有其必然性:一是从社会心理角度,激进主义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余英时指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毛泽东时代充斥着理想主义激情,“大跃进”甫一开局,渐进主义就烟消云散,很多人主观上确实是真诚相信并积极参与着文化跃进。二是迫于政治压力的被动服从。波伏瓦认为,个体不可能摆脱时代的境遇性操控。并非无人看到“大跃进”的虚妄,然而,通过“反右”等不断的政治操弄,动辄得咎的个体早

2017年1月 January, 2017

已噤若寒蝉,“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成为明哲保身的最优选择。三是置身各行业跃进洪流,图书馆无法独善其身。四是不令他人专美的同业竞争需要。跃进大会各图书馆陆续发布的“决心书”、“应战书”,已经为跃进定下了“赶、帮、超”的基调。

### 3 “大跃进”的负外部性

#### 3.1 政治话语形成对行业全方位的把持和控制,图书馆逐渐沦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

为破除妨碍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种种思想障碍,1958年4月,《图书馆学通讯》第4期发表了文化部图书馆处副处长胡耀辉的《在图书馆事业中坚决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为总路线服务》一文;为配合共产主义教育运动,1958年11月和1959年1月《图书馆工作》分别发表题为“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是图书馆坚定不移的方向”和“配合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是图书馆当前的重要任务”的评论员文章<sup>[1]</sup>。但言必称“政治挂帅”,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政治判断,过于强调行业的阶级性,严重扭曲了图书馆的性质与职能:

(1)1958年9月1—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由91所图书馆代表参加的图书馆工作会议,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确定为图书馆工作的首要和中心任务,折射出彼时对图书馆定位的基本认识。

(2)1959年立项的《中图法》为了突出政治正确性而不惜破坏科学分类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列为22大类之首。

(3)是否“又红又专”成为判断先进与落后的唯一标准,使政治热情冲淡甚至压制了提高业务水平的追求。

#### 3.2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超越了经济基础等客观条件,必然造成指标脉冲冲顶后的大幅回落

从图书馆数量来看,天津市曾于1958年7、8月间掀起了民办图书馆热潮,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建立民办图书馆500多个,筹建速度快,基础不稳固。据不完全统计,到1959年能够正常开展业务的民办馆仅剩172个,相当于建馆数字的

37.6%<sup>[2]</sup>。从各项业务指标来看,由于缺乏科学论证,很多跃进指标的制订是脱离实际的,完成也不尽理想:(1)指标制定的随意性。1958年跃进大会前同侪交流之后,参会代表们就把原来带到大会的跃进指标一再拔高。陕西省图书馆的贾馆长连续3次修改指标,安徽省图书馆的代表突击修改、核算本馆指标直至深夜2点钟<sup>[3]</sup>。(2)笔者并未发现未完成指标图书馆的专题报道,然而,通过文献调查,仍能从某些文献中发现一些端倪。如1958年《图书馆学通讯》第5期评论员文章:“本年国庆节献礼已过,有的图书馆已提前或超额完成各项任务,有的现已做到基本完成,也有的完成较差,或者计划指标中的某些项目进度还很不够,各种情况是不平衡的。”<sup>[4]</sup>(3)一些既定指标的完成,是以群众运动式的工作方法,以透支人力、物力为代价勉强达成,未能形成长效机制。如上海图书馆在“2天通宵攻下思想堡垒”的号召下,2天内就写出17600余张大字报。这种无视生理极限的精力透支,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 3.3 图书馆业务方向的畸形发展

主要表现为:(1)片面追求发展读者、流通量指标,忽视收藏;(2)服务对象方面,只注意普及,而忽视提高;(3)强调“开门办馆”、“送书下乡”,而忽视图书馆基础和阵地建设,给目录组织、典藏管理等工作带来一系列问题,造成图书的损坏和丢失。南通市图书馆馆内建了3个炼钢高炉,一半的馆舍作为“大跃进”展览会会场,使图书馆阵地工作受到严重影响;1958年,徐州市图书馆大搞图书普及,把大批图书分散运往农村,使100多个流动书箱的图书丢失殆尽<sup>[5]</sup>。

#### 3.4 无视客观条件开展超前的服务方式

开架借阅一哄而上,在不具备必要的监控措施的条件下就大范围实行开架借阅,固然便利了读者,但也造成严重的图书乱架、损坏和丢失现象,破坏了图书馆孱弱的典藏基础。如湖南省图书馆许可读者进入书库自行取书,造成藏书特别是贵重善本古籍的大量丢失<sup>[6]</sup>。

#### 3.5 对学人、学科的批判缺乏科学态度,以业余性对抗专业化

在理论界,把一些具有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

点的人都作为“白旗”加以批判,即“拔白旗、插红旗”。图书馆界打破了“技术中心论”、“超阶级、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术,“北刘南杜中皮”的学说受到批判。《图书馆学通讯》1958年第5期刊载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同学集体撰写的3篇批判文章,武汉大学批判皮高品和徐家麟的文章中,批判焦点“厚古薄今”一词出现达7次之多。有破则有“立”,组织青年教师和学生编教材、写专著成为“插红旗”的重要途径。北京大学党委提出“苦战40天,向科学研究大跃进”的暑期号召后,图书馆学系师生在10天时间内即写出批判论文4篇、调查报告58篇,完成了4门课程教材的初稿,“图书馆学基础”10万字的讲义5天时间就全部完稿<sup>[7]</sup>。大量学界中坚被批判,专业人员的缺位和难以保证质量的速成教材,极大地削弱了图书馆学科研、教育力量和教学质量。

### 3.6 “大跃进”及以后“调整”导致图书馆数量剧烈波动

1952年,江苏省10所较大的高校图书馆藏书量共665697册。“大跃进”后,高校增至74所,图书馆藏书因此大量分散。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一些不具备独立建制条件的高等师范院校被撤销和合并,至1966年减少到59所,馆藏被调拨给其它高等师范图书馆或公共图书馆,加剧了接收馆的分类困难和图书积压。

## 4 “大跃进”的正外部性

### 4.1 图书馆数量激增、类型更趋完善,服务能力大大提升

4.1.1 图书馆数量不断增加,类型日趋完善,馆藏迅速增长。建国伊始,全国各类图书馆总数不到400个,其中公共图书馆只有55个,藏书量1000多万册。1958年公共图书馆一跃达到922所。高等学校图书馆由1957年的229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增长462.8%。1959年10月,中国科学院系统图书馆由解放初的17所增到113所,藏书由63万册增至600余万册,10年增长10倍。农村图书室与工会图书馆等基层图书馆从无到有,发展更快。1958年底,农村公社图

书馆达到47万多个,工会图书馆也由建国初的44所发展到35580所。在公立图书馆的缝隙中,民办图书馆顽强生长,成为公立馆有益的补充。据1958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民办图书馆人人夸”统计,仅北京、上海、吉林等15个省、市已有民办图书馆3847个。截止1958年底,全国已有30多万所图书馆,藏书约2亿6000多万册,与解放前图书馆事业最繁荣的1936年相比,图书馆数增加了60多倍,藏书增加了12倍多。各类型图书馆勃兴,交织成覆盖空前的网络结构,图书馆体系已然成型。

4.1.2 读者人数、图书流通量爆发式增长。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图书馆跃进大会总结报告中指出“开门办馆是图书馆的方向性问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图书馆根本区别的问题。”<sup>[8]</sup>由于阅览人次和图书流通册次的直观性,成为评价“开门”效果以及读者服务工作成效的共通性指标。各图书馆踊跃提出了“翻一番”,甚至十几番指标的“工作规划”。从后续追踪来看,通过扩大读者范围,延长开放时间,送书上门等服务方式的改进,一些图书馆设立的指标得到了落实。如山东省图书馆1958年全年跃进规划为5,491,880借阅册次,读者人次2,703,274,均比1957年增加8倍。到1958年8月底已超额68%完成了全年流通指标,读者人次也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sup>[9]</sup>。

从流通品种来看,政治类书籍流通率普遍增高。1959年,南京航空学院图书馆图书流通率较1958年增加40.3%,政治书籍流通则同比递增308%<sup>[10]</sup>。从读者成份来看,开门办馆,主要是面向基层开展流通服务,工农兵读者比重上升明显。1959年,通过巩固厂社图书馆和图书流通站,北京市崇文区图书馆工人读者占比超过60%<sup>[11]</sup>。江苏省太州市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农民读者任务指标,要求1958年新读者中,农民读者要占20%<sup>[12]</sup>。

### 4.2 互助协作得到充分发展

4.2.1 国际协作更趋深入。建国以来,图书馆国际协作有了一定发展,与国外同行建立起以图书交换为主要模式的友好往来,大跃进期间,得到了跨越式发展。1959年7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与

全世界 56 个国家,1290 个单位建立了书刊交换关系,接收书刊 261,741 册,寄出书刊 136,265 册。其他大学图书馆和政府机关图书馆,也有不同程度的国际往来。

4.2.2 克服本位主义,馆际协作更加成熟和普及。1957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57 次会议批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方案明确了“建立中心图书馆”、“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两项重要工作。这是建国以来第 1 次全国性的文献资源协调活动,图书馆事业走上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资源共享的道路<sup>[13]</sup>。1958 年起,分别由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和中科院图书馆主持,在北京先后成立了“中文、俄文和西文图书卡片联合编辑组”,几年来共分编图书 25 万多种,面向全国 6000 多家图书情报单位发行统一铅印的编目卡片 6000 多万张。1959 年 7 月,在文化部和教育部领导下,全国 70 多个单位,以大协作的方式编制全国统一的大型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区域性的协作组织也在全国范围遍地开花。通过馆际互借、图书调拨等优势互补的馆际协同,弥补了个体馆文献支持能力短板。1958 年 6 月 6 日,由人大图书馆召集,北大和林业研究所等 7 个单位图书馆组成的互助协作组举行第 1 次会议,8 月,首都高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即告成立<sup>[14]</sup>。西安地区各图书馆开展了以省图书馆为中心,以制发通用阅览证、单位借书证,成立图书采购协调小组,联合举办业余大学等协作形式的全面馆际大协作<sup>[15]</sup>。

4.2.3 单体图书馆内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更加紧密。有些馆调整了劳动组织,合并了工序,改变了馆内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战的传统,加强了各个工作环节的联系,减少了人力,提高了功效。

4.3 推行技术革新,推动了工作方式转变和工作效率提升

1958 年初,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并要求“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自此,技术革新形成了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为有效推动革新,许多图书馆成立了“技术领导小组”作为领导和实践机构。例如武汉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选拔骨干

成立“技术革新中心小组”,具体指导成员馆的技术革新,并对研究成果加以收集、定型、推广<sup>[16]</sup>。

技术革新有两种取向:(1)打破传统手工式操作大搞机械、半机械化,以单个项目乃至整个工序的技术改造为目标的硬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曹先声发明了油印机印刷卡片法,提高新书目录卡片制作速度 10 几倍。(2)改善劳动组织,改进工作方法,以求减少工序的软调整。山东省图书馆编目由“工段作业法”改为“一条红线作业法”,提高工效 50% 左右。

4.4 图书馆的人才结构和组织架构更趋优化

4.4.1 精简编制,勤俭办馆,真正实现了减员增效。一些图书馆通过下放和其他途径精简的人员比例达 40% 以上,武汉市图书馆人员编制由原来的 71 人减为 38 人,减少了 46.5%。

在勤俭办馆方针指引下,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通过建立分层审批制度削减办公费,取消诸如出差卧铺、福利补助等各种行政管理费的方式,1958 年节约经费 8487 元,占总经费 10%。首都图书馆将新书加工成本由 1957 年的平均 0.134 元/本降为 1958 年的 0.068 元/本。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33 个省市公共图书馆在 1958 年减少人员 21.8%,经费节约 23.6%,工作效率反而得到提高。

4.4.2 通过针对性的培训,馆员素养得到强化

“大跃进”前,人员素养差强人意:大量业务中坚卷入政治运动靠边站。如时任南京图书馆馆长汪长炳所说,年老、照顾、无处分配的干部被送到图书馆成为常态。

“大跃进”以来,图书馆提出了各种人力培训规划。浙江省图书馆提出,争取五年内“红专”达到干部总数的 70%,并认真推行师父带徒弟的方法。为完成规划,各馆采取了实习、参观、举办短期进修班、参加业余学校等多种方式,使理论及业务素养有了很大提高。北京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1958 年 10 月组织了红专夜大学,至 1959 年 11 月,仅一期培养在职学员 154 名。

4.4.3 图书积压等多年的遗留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由于:(1)历史遗留问题;(2)出版、发行大跃进的产业链导致质次、高复本图书大量增加;

(3)空间不足。“大跃进”前北京师范大学无独体图书馆,分散达31处之多。图书积压在各类型图书馆普遍存在,全国21个公共图书馆就有700万册图书没有登记。

“十比倡议书”提出比清理积存倡议以来,各图书馆积极行动,不同程度地消减了库存压力。贵州省图书馆解放以来积压线装书11万余册,外文图书8000余册,1958年10月前完成了线装书,年底完成了外文图书的整理和分编,做到了零积压。

#### 4.5 单体馆服务能力增强,读者服务得到推进

4.5.1 办馆方针更趋明确,读者中心导向得到加强。以提升服务能力为目标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人本”作风的转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到天涯海角为读者查找资料”的口号堪称代表。

4.5.2 隔离读者,不利于“开门”的诸多藩篱被拆除:(1)“大跃进”前鞍钢技术图书馆借书证必须持介绍信才能办理,“大跃进”后,该馆废除或修改了期刊不外借,不准代借等8条不合理制度,推行送证下厂,工人读者大量增加。(2)一些便利读者的新型服务被采用:开架借阅被普遍推广;一些有条件的图书馆还通过设置专门阅览室或专家研究室,编制专题或联合的目录、索引,设置显微图书设备,进行图书复制和调拨等方式方便读者。(3)压缩加工环节时滞,提升工效。首都图书馆采编部实现了“一天出书”的口号。(4)采取延长开馆时间、扩大读者范围等内涵及外延式扩展提高服务覆盖。上海市六个图书馆提出“全年开放、日日服务”的倡议。科学院图书馆向院外文教机关开放,1958年团体借书单位达832个,是1957年的1.6倍。

4.5.3 读者辅导得以深入发展。读者辅导是帮助读者克服图书馆恐惧,增强图书馆黏性的有效方式,大跃进中采取了多样的读者辅导方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过橱窗展示、读者座谈会等形式向读者宣传馆藏,通过预约管理等方式减少拒借率。推荐书目作为一种揭示馆藏的方法得到普遍采用。浙江省图书馆1958年编制的推荐书目是1957年的23倍以上;辽宁地区仅1958年上半年便编制推荐书目130多种,超过了历年的总和。

## 5 冒进的折返与修正

1961年,致力于消除急躁冒进的消极后果,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图书馆事业开始了持续到文革前长达4、5年的调整:其一,图书馆定位更趋灵活、准确。按照八字方针,重新确定了图书馆为群众与科研服务两者不可偏废的关系,但不再一刀切,而是允许各馆根据实际有所侧重。1958年,辽宁省图书馆提出科学研究和大众服务两项任务并重。1961年,辽宁省委宣传部责成省图书馆缩短战线,重点抓好为科学研究服务和业务辅导。其二,调整了发展速度与规模,使图书馆事业的体量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以公共图书馆为例,1957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大约有400所,到1960年已经突击发展到1093所,调整后通过撤销、合并,至1962年只剩下了541所。其三,图书馆工作的连续性和继承性非常突出,调整后对读者服务、目录等各项业务进行整顿,重新恢复了大跃进中遭到破坏的一些制度,并制定了新的规章。宁波市图书馆在大跃进中,农村流通投放图书较多,遭受一定损失,调整后认识到充实藏书的重要,适当缩减了流通面,建立了阅览室辅助书库。1961年8月15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自然科学部停止办理对院外代借代还工作。其四,学术研究方面,继续贯彻“双百”方针,1962年以后,目录学、图书馆史等领域研究得以深入,图书馆学研究在体系上由建国初不太完整逐步走向比较完整。其五,图书馆学教育方面。对图书馆学系的重视程度提高。1962年6月,北京大学任命在跃进中受到批判的刘国钧为图书馆学系主任,是对专家办学取向的复归,无疑具有象征意义。1962年调整期编写的《图书馆学引论》、《目录学》等一批教材,虽然是内部印刷出版,但与大跃进期间编写的教材相比,内容充实、质量更高。

## 6 对当下图书馆事业的启示

### 6.1 理性是保障图书馆事业方向的基石

亟须建立国家理性,置权力于公民社会的监督

2017年1月 January, 2017

之下,才能抑制权力冲动,避免意识形态逾越“纲领性指导和哲学思想工具”范畴而出现泛政治化倾向。从个体视角,公民理性是专制的反制,必须摒弃“表白政治”,也需反思个体犬儒引致的“合谋”性政治冷漠,建立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和谐共存。

## 6.2 应贯彻实事求是精神,正确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

唯意志论倾向是“大跃进”运动的哲学依据,表现为对主体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大肆渲染,固然激活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基层动员。然而,脱离客观条件的支持,单纯诉诸群众运动,无疑是对群众路线的绝对化理解,容易僭越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滑入“唯意志论”的泥潭。

## 6.3 图书馆定位需要可预期的稳定性

没有稳定的方向定位,不利于读者形成稳定的预期,势必影响决策和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建国以来,办馆宗旨一直在实用主义方针指导下兜转摇摆。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是年,全国第一次图书馆工作会议提出了“为科学研究服务,普及文化教育”的方针,明确了今后的方向和目标,“大跃进”以后,“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提法达到空前,为满足生产跃进需要,主要力量投注于一般群众服务,从而放松了教学和科研服务。

## 6.4 要有充分的组织保障,政府仍需成为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政府主导性体现在四个方面:(1)图书馆事业是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上层建筑之一,需受制于经济和社会条件。(2)制度化、法制化是图书馆建设的根本和保障。(3)图书馆的设立及运营需要不菲的启动资金和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唯有公共财政方可长期支撑。(4)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发展步伐和节奏需要政府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合理把控,否则,即使短期被推上高潮,也难逃盛极必衰的因果。

## 6.5 应多维度丰富图书馆经营体系,最大限度保障民众的信息获取权

“大跃进”使图书馆触角前所未有地喷张,民众的信息获取权保障达到了一时高度。在国家推

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更应该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民办图书馆等私人图书馆,完善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民众的阅读权等文化权益。文化部2012年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规定,鼓励民间资本捐建或捐资助建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采取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兴建民间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相应的配套应该及时到位,以保障政策得以切实履行,落在实处。

### 参考文献:

- [1] 邹华享,施金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69.
- [2] 佚名.民办图书馆中存在的问题[J].图书馆工作,1959(12):7-9.
- [3] 陈苑安.跃进大会花絮[J].图书馆工作,1958(5):10-12.
- [4] 佚名.图书馆应更好地完成本年和全面安排明年的工作[J].图书馆学通讯,1958(5):1-2.
- [5]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文化艺术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430.
- [6] 余贻骥.难忘岁月:余贻骥回忆录[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88.
- [7] 史永元.苦战四十天,向科学研究大跃进[J].图书馆学通讯,1958(5):13-15.
- [8] 夏衍.文化部夏衍副部长总结报告[J].图书馆学通讯,1958(2):1-4.
- [9] 陈光年.山东省图书馆是怎样完成图书流通跃进指标的?[J].图书馆学通讯,1958(5):37-38.
- [10] 佚名.全心全意为教学服务、为读者服务[J].图书馆学通讯,1960(4):30.
- [11] 佚名.决心不断革命,永远力争上游[J].图书馆工作,1960(3):40-43.
- [12] 晓董.反浪费、反保守、图书馆工作大跃进[J].图书馆工作,1958(4):16-24.
- [13] 吴晞.文献资源建设和图书馆藏书工作手册[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13.
- [14] 于声.北京七院校图书馆互助协作组第一次会议纪要[J].图书馆学通讯,1958(4):51-52.
- [15] 金混.西安地区图书馆开展大协作[J].图书馆学通讯,1958(6):10-11.
- [16] 余春燕.大跃进时期我国图书馆的技术革新运动[J].河北科技图苑,2013(6):9-11.

### 作者简介:

许静波(1963—),女,副研究馆员,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长春,130024。